

新  
民  
說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

論  
學  
會  
友

CHANGCH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



余英时文集

第十一卷

論學會友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Lunxue Huiyo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责任编辑：虞劲松  
装帧设计：刘 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学会友 /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余英时文集：11）

ISBN 978-7-5495-5144-6

I. ①论… II. ①余…②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84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0.625 字数：256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4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佳

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 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

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 原序

### 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尽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

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开拓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化(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资本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 原序二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 2004 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

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 目 录

## 第十一卷 论学会友

---

- 1 《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自序
- 20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序
- 28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序
- 53 唐翼明《魏晋清谈》序
- 63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本新序
- 71 何俊《南宋儒学建构》序
- 74 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  
——柳存仁《和风堂新文集》序
- 93 资本主义的新启示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序
- 100 张朋园《郭廷以 费正清 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序
- 106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序
- 118 《俗文学丛刊》序

- 125 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序
- 131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序
- 138 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序
- 153 从“游于艺”到“心道合一”  
——《张充和诗书画选》序
- 169 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序
- 188 《天禄论丛——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序
- 192 李建军《学术与政治——胡适的心路历程》序
- 196 未尽的才情  
——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 196 引言
- 198 一、事业心与傅斯年
- 212 二、顾颉刚与胡适
- 231 三、顾颉刚与国民党
- 239 四、1949年以后的顾颉刚
- 263 五、顾颉刚与谭慕愚
- 298 结语
- 300 附录一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 311 附录二 顾颉刚的史学与思想补论
- 317 后记
- 323 编者后记 / 沈志佳

## 《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自序

这部《会友集》收集了我近二三十年来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是我相交已久的,但也有少数尚无缘识荆,只能算是“神交”。我生平不会写应酬式的文字,友人向我索序,我必尽可能以敬慎之心回报。首先我必细读全稿,力求把握住作者的整体意向;其次则就我所知,或就原著旨趣加以伸引发挥,或从不同角度略贡一得之愚。但无论从什么方面着笔,我都坚守一个原则,即序文必须环绕着原作的主题发言。换句话说,原作为主,序文则居于宾位。序文的千言万语都是为了凸显原作的贡献及其意义。喧宾夺主或越俎代庖是写序的大忌。用这种方式写序当然是比较费力的,往往逼我去进行一些独立的研究。但是我也在写序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知识的乐趣:经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之后,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某些特殊方面,我的认识从含混变为清晰,有些问题获得进一步的澄清,有的基本概念则得到更有系统的整理。我的序文对友人有无涓滴之助尚不可知,但我受到他们著作的激励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虽写了不少的序,却毫无“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

书名取义于曾参“以文会友”,纪其实也。

最早鼓励我将序文收为一集的是刘再复先生,接着敦促我付诸

实践的则是潘耀明先生。如果不是他们两位的偏爱和热心,这个序集是否会面世恐怕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但这本书终于能辑成则完全是彭国翔的劳绩。国翔近年来收集我的文字很多,有的连我自己也忘记了。所以自决定接受明报出版社的书约之后,我立即向他提议,请他担任本书的编者。这里所收的几十篇序文都是他从各处辛苦搜寻得来的。言辞已不足表达出我对他慷慨相助的感受,因此索性不说任何客气话了。

这里所收的序文,当然不能说是穷尽无遗,但聚在一起,数量已出乎我的最初估计之外。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么我是不是犯了“好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记忆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为人作序”的事虽偶然一见,但似乎并未形成过普遍的风气。相反的,在中文著作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这一现象倒是异常突出。友人向我索序和我有“义不容辞”之感,大概都不免受了一种特殊文化氛围的感染。难道“为人作序”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特色吗?

这个疑问在脑际浮现之后,我的好奇心被挑动了起来。我想知道,“序”在中国书写史上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经过了哪些演变的阶段?“序”的传统进入现代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我深感兴趣而亟须得到解答的。然而仓促之间我竟不知从何处下手。因为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专题研究才能找到解答的线索,而我一时却想不起“序”的历史是否曾经受到过现代文学史专家的青睞。不得已,我只好自己动手,匆匆进行了一次探源溯流的尝试。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初步报告,疏失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请读者切实指教。

“序”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文体”(genre),至迟在萧统编《文选》时已正式成立。如果通全部古典文学史而言,我们大致可以将“序”分为两大系统。先说与本文无关的系统,即在游宴、诗会、饯送、赠别等场合的即兴之作,六朝以下许多著名的“序”都属之。一言带过不提。另一大系统则是为书籍所写的“序”,但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了说明传世典籍的缘起及其涵义而作,如《尚书序》、《毛诗序》是也。后世为前代著作,包括诗文集等所写的序也应划归这一类。总之,这都是为古人遗作而写的。第二类是“自序”,最著名的当然是《太史公自序》。这一类的“序”在后代也有继承和发展。庾信《哀江南赋序》说“昔桓君山(谭)之志士,杜元凯(预)之生平,并有著书,咸能自序”,即其明证。最后一类则是应并世作者之请而写的序,这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主题。前两类在“序”史上虽然也很重要,但这里只能割爱,以避枝蔓。

《文选》李善注《三都赋序》,题下引臧荣绪《晋书》曰:

左思作《三都赋》,世人未重。皇甫谧有高名于世,思乃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也。(见卷四十五)

同时的作者向名家求序并得到积极回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记载,但其事或已始于汉末、三国之际,因为文人交游之密和文学风气之活跃早在建安时期(196—220)便已展开了。《文苑英华》宇文道《庾信集序》结语云:

余与子山风期款密,情均缟纻,契比金兰,欲余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卷六九九)

作者亲定诗文集而向友人索序,就我所知,这似是最早的例子,但其事已在公元六世纪的后期了。我们也不能据此而断定庾信和宇文述两人是始作俑者。在他们之前的两百年中同样的事情应该已经出现过,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或因我的疏漏,目前只能追溯到北周罢了。

在《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中,“文集”的“序”占了九卷,其中关于个人文集的便有五十篇之多,时代则集中在中、晚唐。细检这些序文,有四篇可以确定是应文集作者之请而写的,即独孤及《赵郡李公(华)中集序》、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和郑亚《会昌一品制集序》。这里所用“中集”、“前集”之名是唐代特有的风气。元稹《序》云:“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皇帝明年秋当改元,长庆讫于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引文据《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可知“长庆集”本来也可以称作“前集”或“中集”。独孤及《李公中集序》则说:“他日继于此而作者,当为后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唐代作者往往分期编定自己的文集,以前、中、后分别之。大概前集、中集都是生前亲自编定的,因此作者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找相知很深的友人写序;至于后集或全集,则要等到作者的后代、门人或故旧来整理编定,序文当然也是身后的事了。杨嗣复《权德舆文集序》说:

公昔自纂录为制集五十卷,托于友人湖南观察使杨公凭为之序,故今不在编次内。(见《唐文粹》卷九十一)

作者自编前集、中集而请序于友人在唐代已成通行的习惯,这是另一条最明确的证据。而且有些序文虽是为遗集而作,但作者生前或曾亲托,或有遗命指定,也可以划归同类。最明显的如,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写序,便是因为柳宗元病死前以“遗草”相托;白居易撰《元少



尹(宗简)集序》，不但因为元宗简是他的朋友，而且临终遗言：“遗文得乐天为之序，无恨矣！”

从上面简略的追溯可以看到，为相知者诗文集作序，大致起源于魏、晋之际，至唐代而形成文学界的普遍风气。由于“文集序”——包括为已故作者写的——在唐代的数量激增，以致宋初姚铉在《唐文粹》中不得不特标“集序”的名目，以区别于一般的“序”。现在传世本《毘陵集》(独孤及)和《权载之文集》(权德舆)也有“集序”一目，不知是唐代流传下来的，还是后代改定的。无论如何，这一新名目的成立折射出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但为并世相知作序在唐代并不限于文集，论学专著也往往有之。权德舆《张隐居庄子指要序》和裴休《释宗密禅源诸论序》(均见《唐文粹》卷九十五)便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前者是《庄子》的诠释，后者则是禅宗源流的分疏，这两篇序文都是应邀而写的。这种论学性质的“序”越到后来越重要。

无论是“集序”或论学的“序”，基本规模在唐代已经奠定了下来，唐以后大致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宋代便是明证。试以吕祖谦《皇朝文鉴》与《文苑英华》作比较，可以确定为作者生前所请之序有三篇。但《文鉴》以南渡断代，时间远比《文苑英华》为短。为了进一步的引证，我用取样方式，检查了十几部卷帙较多的名家专集：北宋是范仲淹、欧阳修、李觏、苏轼、苏辙、王安石、司马光；南宋是周必大、朱熹、杨万里、陆游、楼钥，共十二家。每家都有应作者之请而写的“序”，少则一篇，多则三、五篇，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权德舆诸集相较，情况相似。这一系统的“序”在宋代仍以诗文集为多，不过论学专著也往往有之，如刘跂《赵(明诚)氏金石录序》(《文鉴》卷九十二)、杨万里《袁机仲(枢)通鉴本末序》(《诚斋集》卷七十八)即其显例。这两部书是宋代名著，因此当时学术的新动向也在“序”中有所呈露。从周必大《初寮先生前后集序》(《文忠集》卷五十三)可知宋人仍沿唐人习